史镜

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 易　虹

在中共历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纠纷和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袭之术，概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

康生的发迹，与他的三次政治投机密不可分。

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机是追随李立三。1898年，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在当地算是一个书香门第。1917年夏，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1924年7月，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康生当上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总书记，但中央大权实际上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掌握。于是，康生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对李的“左”倾表示极度“忠诚”，很快于1930年2月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攻打大城市，“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走俄国由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错误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害。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但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竭力追随、拥护和支持。同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康生便迅速转向。

康生的第二次政治投机是投靠王明。王明1925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副校长米夫赏识，地位日渐提高。王明于1929年回国。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包办整个会议的米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目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前后后，立刻转向有背景有实权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在党内十分孤立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支持。于是，王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4年中，中共中央实权一直掌握在王明手中，康生在此期间爬上中央领导岗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示了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康生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1949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一养就是6年多。直至1955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为“政治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第一书记遭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让康生无法容忍。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委员。让康生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不服气，于是就称“病”闹情绪撂挑子。

1954年高饶事件被揭露之后，康生的“病”根已除，于1956年初复出。但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无疑给他一个沉重打击。但为了东山再起，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康生的第三次政治投机，就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八大后两个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工作，目的在于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位置。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提法。1959年12月，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1960年1月，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

1962年，康生制造“《刘志丹》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进一步巩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各个领导机关，指摘“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他提出原有的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与此相连，康生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康生一手制造的。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中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

威武不屈的南宋使臣

□ 晏建怀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一书中，曾选了一首叫《春阴》的七律，诗曰：“关河迢递绕黄沙，惨惨阴风塞柳斜。花带露寒无戏蝶，草连云暗有藏鸦。诗穷莫写愁如海，酒薄难将梦到家。绝域东风竟何事，只应催我鬓边华！”

这首诗歌的作者叫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建康元年（1126年）底，金人南下侵宋，攻破开封，搜尽宫室钱财珍宝，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和大臣、妃嫔及能工巧匠三千余人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山河破碎，无论帝王之家抑或普通人家，无一例外遭受洗劫，朱弁苦心经营起来的家，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他只得加入逃难的队伍，携家南奔。

北宋灭亡后，刚刚登上皇位的南宋高宗被金军追杀，惶惶如丧家之犬，便多次征召爱国志士赴金求和。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招募大金通问使，朱弁见这是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挺身而出，自荐于朝廷。经过层层筛选，宋高宗最后拍板，任王伦朝奉郎、假刑部侍郎，为大金通问使，任朱弁修武郎、假吉州团练使，为通问副使，于当年十一月率队赴金。这一年，朱弁已经四十二岁了。

当时，宋金并未开启正式和谈，两军时有鏖战，虽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金人穷兵黩武，以磔锉凶残著称，无道德底线，以至“常斩来使”。“靖康之难”中，当时北宋当局派到驻扎于开封城外金营求和的大臣中，就有不少惨遭金人杀害，吏部侍郎李若水因为拒绝金人的收买、怒斥金人不霁信义，甚至被金人割颈断舌，死得十分惨烈。所以，当时宋臣使金，真如赴汤蹈火，是需要舍生忘死的勇气的。果然，王伦、朱弁一行抵金后，根本还没有启动谈判，就被金帅完颜宗翰全部扣押于云中郡（今山西大同），作为人质，统统沦为“阶下囚”，一扣就是五年之久。五年对于普通人或许不怎么漫长，但对于失去人身自由、被拘禁于异域的王伦、朱弁来说，自然是苦闷的，加上金人的威逼恫吓，想必愁肠百结，度日如年。

绍兴二年（1132年），即朱弁使金被扣五年后，金人某天忽然派专人前来通报说，和议可成，让王伦和朱弁二人中选派一人到金元帅府接受国书回国，但另一位必须继续扣留在金国，让他俩商量确定谁去谁留。这无疑是一天大喜讯，既有出使的佳绩，又有飞出囚笼、回归故乡的自由。不过这也是一道难题，在做这道艰难的选择题时，朱弁以坦荡的胸怀作了十分干脆的决定，他对王伦说：“我自来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更不会借机先归。希望作为正使的你接受国书，归报天子，促成两国和好，保百姓安康，如此，我即使暴骨外国也无憾了。”于是，他主动放弃了归国的机会，继续留在金国。临别之际，他要求王伦把出使的官印留下，视其为符节，随身携带，卧起与俱，他要做一个矢志不渝的宋朝苏武。

虽然王伦带着金人愿意和谈的信息回了国，但真正的和谈并未从此开启，宋金之间依然战事不断，朱弁依然被扣留在金国，看不到归期。在此后漫长的拘禁日子里，朱弁不但要忍受思国思乡的折磨，还不时受到金人的威逼利诱。当时，金国扶持北宋降臣刘豫的伪齐政权，代金统治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在此过程中，金人知朱弁德才兼备，逼迫他到刘豫伪朝任职，还开导他说：“这是你归国的第一步啊。”朱弁听后，义正词严地拒绝道：“刘豫乃国贼，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北面而事之，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的。”金人见他不从，愤怒之下断了他的食物供应，朱弁依然不从。之后，朱弁天天站在驿站门口，忍饥待死，坚决不屈服。不想金人竟被他的坚贞感动了，又照常向他供应食物。

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双方随后遣还被俘、被扣押人员。当年六月，朱弁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六年之久的祖国，形容憔悴，衣衫褴褛，但他官印不离身，“符节”犹在。

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当年陆续派至金国的那些使者共有三十多人，而和议后活着归来的，仅仅三人而已。朱弁在出使的十六年间，受尽金人的凌辱和折磨，依然坚贞不屈，在南宋朝野间传为佳话。所以，他的归来，在南宋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宋高宗单独召见了他，与他近身交谈，听从了他的一些建议，还给予许多赏赐。朱弁在金十六年，经历艰难困苦，身心备受摧残，归国第二年，他就因病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

中华春秋

（上接1版）

以求真务实的政治要求保证扶贫工作的真实性

记者：扶贫工作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但依旧存在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情况，因此社会各界对扶贫脱贫成果的真实性比较关注，请问甘肃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

王三运：首先，对共产党员来讲，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政治要求。我们多次强调，扶贫脱贫一定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鼓励立足实际自加压力、加快脱贫进程，但绝不允许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由群众认账才算数。其次，为保证各级减贫数据对得上、脱贫成果信得过，我们制定了配套制度和办法，特别是建档立卡、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等工作，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肯定，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办在我省召开了现场会总结推广这一做法，极大地鼓舞和激励我们更大力度、更好效果地推进这项工作。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我们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化实化这些工作，健全完善有关机制，取得了新的进展。确定了精准脱贫“853”系统管理办法，在大数据平台层面做到对象识别认定、家庭情况核实、致贫原因分析、计划措施制定、扶贫政策落实、人均收支核查、对象进出录入、台账进度记录等8个精准，在村级层面绘制贫困人口分布、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统计、贫困村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进、贫困户脱贫目标任务、贫困人口进出动态统计等5张图，在贫困农户层面建立脱贫计划、帮扶措施、工作台账3本账，确保扶贫对象进、出、退管理更加精准。构建了精准脱贫“4342”验收把关责任体系，对贫困村贫困户是否真正实现了脱贫建立起严格规范的把关制度，在村级由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贫困户四方签字，在乡级由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扶贫统计工作站站长三方签字，在县级由县委书记、县长、扶贫办主任、统计局局长四方签字，在市级由市州委书记、市州长两方签字，层层把关负责，才能报省里，出了问题逐级追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真实可靠。我们还把考核评估作为重要手段，每年对贫困县脱贫工作进行验收。考核组引进了第三方参与，抽调省市县非党政机关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高等院校等有关方面人员全程参加，考评结果各方反映良好，群众高度认可。

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打脱贫歼灭战

记者：甘肃在扶贫脱贫工作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还有288.5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比较繁重。请问甘肃在“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总体考虑和部署是什么？

王三运：扶贫形势任务在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路和举措也要与时俱进完善充实。我们提出，十三五”时期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把脱贫攻坚摆在“一号工程”位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城乡一体发展与精准扶贫脱贫相融合、区域整体开发与到村到户扶持相结合、加大倾斜力度与增强造血能力相耦合，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打攻坚战，构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格局打整体战，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打歼灭战，坚决打赢扶贫开发这场硬仗。

今后五年的扶贫工作，围绕“一个目标、两个步骤”来展开：“一个目标”，就是确保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步骤”，就是2015年到2017年集中攻坚，每年减贫100万人，啃下大头；2018年到2020年巩固提高，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实践中，我们将扭住“巩固、落地、拓展、改革、见效”五个方面聚焦发力。巩固，就是认真开展“回头看”，坚持脱贫不脱钩，进一步抓好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工作，并从大病、灾害、教育、社保等方面不断完善机制，拉起多道“防护网”和“保护杠”，最大限度防止这部分群众再返贫。落地，就是结合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和“1236”扶贫攻坚行动的深入开展，建立健全省市县乡履行扶贫责任的制度办法，切实加强对各级各部门扶贫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1+17”精准扶贫方案确定的各项部署和任务落地生根，一项一项兑现到位，绝不允许出现打折扣、搞变通的现象。拓展，就是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树牢导向、完善思路、强化举措，特别是聚焦“六个精准”继续探索，抓好大数据平台的深化拓展，准确统计基础数据，实现数据互联共通，真正为各级党委政府统筹谋划、科学决策、推动落实提供依据。改革，就是把脱贫攻坚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以改革破解瓶颈障碍、增强动力活力，特别是把扶贫开发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扶贫开发，着力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和生产力布局，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种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汇聚，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合作经营和网络经营，培育壮大区域首位产业和多元富民产业，把贫困地区打造成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尽快富裕起来。见效，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五个一批”的要求，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发展生产让137.3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让46.4万人脱贫，通过生态补偿让3.1万人脱贫，通过发展教育让48.8万人脱贫，通过社保兜底让52.9万人脱贫，不让一家一户掉队，确保全省贫困群众如期进入全面小康。

（上接1版）在从严治党上，他突出强调，慵懒散、奢私贪、蛮横硬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在国家安全上，他多次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强调我军必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上，他鲜明指出，我军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但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14年，他亲自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深刻剖析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带领全军寻根溯源、整体重塑。这种坚持问题导向的态度，反映了坚强无比的勇气和高度自信的力量。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才能发现问题、正视问题，从最坏处做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迎着问题来，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倒逼、问题归零，才能激发出本能的力量，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鉴往知来的历史思维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处处体现出鉴往知来、继往开来的历史思维。这种历史思维，始终表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历史自信，源自对中华文明的深厚感情、对中国和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深刻把握、对当代中国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点的准确定位，体现了习主席领航中国、推动复兴的坚强决心。这种历史思维，始终表现出宽广的历史视野。习主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老师和清醒剂；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是习主席极力倡导的作风，也是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所表现出的政治品格。这种思想作风，突出表现为正确的政绩观。习主席强调，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去；GDP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做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这种思想作风，突出表现为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习主席反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是为政之要、从政之本；再好的行动纲领、再美的宏伟蓝图，不落地、不落实，都一钱不值；抓落实是当前极为重要、极为紧要的一件大事。这种思想作风，突出表现为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习主席强调，大国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换那个口号，这不叫新思想，而叫不稳当；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张蓝图抓到底；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这些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干事创业的客观规律，体现出的是一种极端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牢牢坚持的重要原则。

不断超越的创新精神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既与党的科学理论一脉相承，又注重把握时代的新要求、回应人民的新期待，推动思想观念大突破，指导改革实践大跃升。习主席深刻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些重大思想观点，充分彰显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和不断创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逻辑关系，激励我们不断创新创造，实现超越发展。